

论《孙子》思想在《内经》中的运用

★ 张新渝* (成都中医药大学内经教研室 成都610075)

摘要:《孙子》与《内经》，分别为上古军事名著与医学巨著，然而战争要夺命，医道要救人，因其相悖，故将二著相提并论者少。如将病邪与疾病作为敌方，把人体及正气看成己方，就会发现兵家之两军相争与疾病之正邪相搏，皆存在不是此胜便是彼胜，均乃性命攸关，确有一致之处。具体从“关乎生死，慎之又慎”、“不唯鬼神，致胜可知”、“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”、“避实就虚，以患为利”、“顺势而为，因势利导”五个方面，论述了《孙子》中所含的唯物辩证思想在《内经》中的反映与运用。

关键词:孙子；思想；内经；运用

中图分类号:R 221 **文献标识码:**A

《孙子》与《内经》，分别是成书于春秋与西汉的军事名著与医学巨著，皆被历代的兵家与医家尊为圣典、奉为至宝。战争夺命，医道救人，因其相悖，故将二著相提并论者鲜。其实，若把病邪与疾病作为敌方，把人体及正气看成我方，则不难发现，战争敌我相争、疾病邪正相搏，不是此胜便是彼胜，均乃性命攸关，确有一致之处。本文仅就《孙子》的主要思想在《内经》中的反映与运用，择其要者论述于后。

1 关乎生死，慎之又慎

天地之间生命最为宝贵，兵家相争非死即伤，无论是杀敌还是伤己，皆关系到军民之生死、国家之存亡，而“亡国不可以复存，死者不可以复生”（《火攻篇》），故《孙子》开篇即言：“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”（《计篇》）。作为“知兵之将，民之司命，国家安危之主”（《作战篇》），胜败生死系于一肩，故“名君慎之，良将警之”（《火攻篇》）。此外，冲锋杀敌士卒为之主，故《孙子》还要求将帅应当“视卒如婴儿”，“视卒如爱子”，如果说此举尚有激励士卒“可与之赴深溪”、“可与之俱死”（《地形篇》）之意，那么“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也”（《谋攻篇》），则足显其重视生命之德。

《内经》更是认为“天覆地载，万物悉备，莫贵于人”（《素问·宝命全形论》），医道仁术，虽能生死人，但若不慎不仅“不能起死者”，反“能杀生人”（《灵枢·玉版》），不可不慎。故《内经》要求医家不仅要认真钻研医学理论、全面掌握诊疗技术；还要恪守职

业“四德”，勿犯“五过”、“四失”；临床更要专心致志，“如临深渊”、“手如握虎”、“神无营于众物”（《素问·宝命全形论》），方可“万举万全”、“长有天命”（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），否则反会“绝人长命，予人夭殃”（《素问·离合真邪论》）。即使传授医道，亦当“得其人乃言，非其人勿传”（《灵枢·官能》）。其重视性命，虽与《孙子》相通，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2 不唯鬼神，致胜可知

两军相争，谁胜谁负，因素众多，难以预测。故在迷信盛行的上古社会里，出师利否？战之胜否？必先占卜，须看天意，乞神明示，祈求神助等屡见不鲜。《孙子》则不然，首先认为兵家之道，既不能凭经验办事，更不能祈求鬼神、占卜星象；取胜之道全在人为，如“明君贤将，所以动而胜人，成功出于众者，先知也。先知者，不可取于鬼神，不可象于事，不可验于度，必取于人，知敌之情者也”（《用间篇》）。其次认为战争既是人为的，其胜败就必然可知，只要做到“无恃其不来，恃吾有以待之；无恃其不攻，恃吾有所不攻也”（《九变篇》），即对敌方可能的进攻早做准备，有备无患；“知彼知己”（《谋攻篇》），“未成而庙算胜者，得算多也；未战而庙不算者，得算少也；多算胜，少算不胜”（《计篇》），即全面掌握交战双方的各种情况，并进行反复谋划筹算，“其胜可为也”（《虚实篇》），“胜可知也”（《形篇》）。以上所论无疑是唯物辩证的，也是难能可贵的。

《内经》也鲜明指出，疾病之生皆因人本身之防

* 作者简介：张新渝，成都中医药大学内经教研室主任，教授，长期从事《内经》的研究与教学。

范不及、养生不当，各种病邪乘虚入侵所致，绝非鬼神作祟或上天惩罚。如“虚邪贼风”没有“避之有时”，或未能“恬惔虚无”无法“精神内守”（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），或“饮食自倍，肠胃乃伤”（《素问·痹论》）等等，皆因人为，“此谓自伤”（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），故“凡治病者……观其志意，与其病也。拘于鬼神者，不可以言至德”（《素问·五脏别论》）。即使“毋所遇邪气，又毋怵惕之志，卒然而病者”，虽似“因鬼神之事”者，亦因“此亦有故邪留而未发，因而志有所恶，及有所慕，血气内乱，两气相搏。其所从来者微，视之不见，听而不闻，故似鬼神”（《灵枢·贼风》）。此外，《内经》同样认为疾病之生，虽病因多样、病机复杂、病症纷繁，但并非不可知、不可治，只要全面审察、认真分析、精心治疗，“疾虽久，犹可毕也”，凡“言久疾之不可取者，非其说也”，“言不可治者，未得其术也”（《灵枢·九针十二原》）。其唯物辩证思想昭然若揭，同样难能可贵。

3 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

两军交战，不是敌死便是己亡，为确保取胜，《孙子》提出了“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；不知彼而知己，一胜一负；不知彼，不知己，每战必殆”（《谋攻篇》）这一著名的军事法则，并成为贯穿《孙子》始终的核心思想。首先，为将之道必须具备“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”五个先决条件，即要有“知诸侯之谋”的政治头脑，能“示形”、“任势”、“料敌制胜”、通于“九变”的指挥才能，有“合于利而动，不合于利而止”的决断能力，有“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”的负责精神，对部卒赏罚严明、并能“与众相得”的管理水平，否则不可以为将。

而交战之前，凡为将者更必须“经之以五事，校之以计，而索其情：一曰道，二曰天，三曰地，四曰将，五曰法”，“凡此五者，将莫不闻，知之则胜，不知者不胜”（《计篇》）。即对交战双方及当时的政治条件、天时变化、地理宜忌、将帅人事、制度法则等决定胜负的五个方面，必须全面掌握，了然于心。唯“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，识众寡之用者胜，上下同欲者胜，以虞待不虞者胜，将能而君不御者胜”（《谋攻篇》）。倘若“不知诸侯之谋，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”（《军争篇》）或“知吾卒之可以击，而不知敌之不可击，知敌之可击，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”，“知敌之可击，知吾卒之可以击，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”（《地形篇》），则必败无疑，至少不能全胜。显而易见，只有知彼知己，成竹在胸，方能奇谋于战前，决断于先机，决胜于千里，立于不败之地。

医家之道，虽能救死，亦能杀生，全在医家一念之间。故《内经》首先要求凡为医者，必须“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中知人事”（《素问·著至教论》），“必明天地阴阳，四时经纪，五脏六腑，雌雄表里，刺灸砭石，毒药所主，从容人事，以明经道”（《素问·疏五过论》）；学习钻研还要做到“善言天者，必有验于人；善言古者，必有合于今；善言人者，必有厌于已”，唯有“如此，则道不惑而要数极，所谓明也”（《素问·举痛论》）。凡“人事不明”、“受术不通”（《素问·疏五过论》）皆不可以为工；即使一知半解、不求甚解，“未满而约之”亦“不可以为天下师”（《灵枢·禁服》）。而诊疗之际，更应“切脉动静而视精明，察五色，观五脏有余不足，六腑强弱，形之盛衰，以此参伍，决死生之分”（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）。显然，只有“知丑知善，知病知不病，知高知下，知坐知起，知行知止”，并“用之有纪，诊道乃具”，才能“万事不殆”（《素问·方盛衰论》），从而确保病家之性命和健康。如果“守学不湛”，临证又“知左不知右，知右不知左，知上不知下，知先不知后，故治不久”（《素问·方盛衰论》），贻祸无穷，后患不浅。

4 避实就虚，以患为利

战争无情，我不灭敌，敌便灭我，如何杀敌保己，是任何战争的根本目的。为此，在“知彼知己”法则指导下，《孙子》认为至关重要者有二：其一，当“避实而击虚”（《虚实篇》），即尽量避开敌方的优势，专门寻找敌方的弱点而攻击之。如当两军对阵，决战伊始，敌势正盛，则应“强而避之”，“锐卒勿攻”，“无邀正正之旗，勿击堂堂之阵”（《军争篇》）。因为一般的规律是“朝气锐，昼气惰，暮气归”，故宜“以治待乱，以静待哗”，“以近待远，以逸待劳，以饱待饥”，待其士气低落、士卒思归、无心恋战，方可一鼓作气“击其惰归”（《军争篇》），则可全胜。

其二，“以患为利”（《军争篇》），即变不利、甚至患者为利。所谓“计利已听，乃为之势，以佐其外。势者，因利而制故也”（《计篇》）。即意在当战势虽不利于己，则应尽量利用、甚至创造有利于己的条件，并千方百计地诱使敌犯错误，化敌之有利为不利，变我之不利为有利。如“敌逸能劳之，饱能饥之，安能动之”（《虚实篇》），“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近”，“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，实而备之，强而避之，怒而扰之，卑而骄之，逸而劳之，亲而离之”（《计篇》），“易其事，革其谋，使人无识；易其居，迁其途，使人不得虑”（《九地篇》），“善动者，形之，敌必从之；予之，敌必取之；以利动之”（《势篇》）。一旦敌方之势变，或上当受骗，

我方则“攻其不备,出其不意”(《计篇》),就能“以少击众”,“以弱击强”(《地形篇》),“故能自保而全胜也”(《形篇》)。这种任何事物并非一成不变,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,以及主张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认识,显然是辩证的、积极正确的。

疾病亦无情,正不祛邪,邪便伤正,如何祛邪存正,也是所有医家的根本目的。因此,《内经》认为当病势正盛,正邪相搏,交炽难分,斯时治以针刺,虽可逐邪亦可伤正,故“病之始起也,可刺而已;其盛,可待衰而已”(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)。其目的就是要“避实而就虚”,俟病势衰减,正气回归,邪气独留,方其时以刺,则邪气可逐而正气不伤。《灵枢·逆顺》所谓“兵法曰:无迎逢逢之气,无击堂堂之阵。刺法曰:无刺熇熇之热,无刺漉漉之汗,无刺浑浑之脉……方其盛也,勿敢毁伤,刺其已衰,事必大昌”即属此意。即使用药物以治,虽说“有故无殒,亦无殒也”,亦当“衰其大半而止”(《素问·六元正纪大论》),“无使过之,伤其正也”(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》),均在审时度势,以祛邪存正,与《孙子》思想一脉相承。

另一方面,《内经》认为人的生、长、壮、老、已整个生命过程,如女子七岁至七七,男子八岁至八八,人之十岁至百岁(详见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、《灵枢·天年》),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。此外,自然变化的客观规律,同样不可抗拒,而当其变化异常,就会影响人体而致病甚至死亡,如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谓:“夫百病之生也,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,以之化之变也”,尤其“乘年之衰,逢月之空,失时之和,因为贼风所伤”以致人“卒然暴死暴病者也”(《灵枢·岁露论》),于生命与健康更是为患为害。然而,《内经》认为只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,掌握并利用这些规律,通过正确、积极的养生保健,变不利为有利,以患为利,从而却病延年又是完全可能的。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中所谓的“圣人”们,之所以能“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”,甚至“身年虽寿,能生子”,就在于不仅是“知道者”,更是“合于道”者,以其“德全不危也”。其唯物辩证认识不仅与《孙子》

殊途同归,并因其古往今来用之实践行之有效,更是难能可贵。

5 顺势而为,因势利导

战争的胜负,取决于双方的斗智斗谋,故《孙子》说:“兵者,诡道也”(《计篇》)。为求取胜,《孙子》在“知彼知己”与“避实就虚”、“以患为利”的战略原则与思想的指导下,贯穿着顺势而为、因势利导的战术方法。如行军必须“绝山依谷”、“绝水必远水”、“视生高处,无迎水流”、“绝斥泽,惟亟去无留”、“平陆处易,而右背高,前死后生”(《行军篇》);作战更是“高陵勿向、背丘勿逆、仰北勿从”(《军争篇》),“散地则无战,轻地则无止,争地则无攻,交地则勿绝,衢地则合交,重地则掠,圮地则行,围地则谋,死地则战”(《九地篇》),“凡火攻,发火有时,起火有日。时者,天之燥也;日者,月在箕、壁、翼、轸也”(《火攻篇》,笔者注:古天文学认为月亮行此四宿之日,气候多风,故宜放火。);具体是攻是守,则“十则围之,五则攻之,倍者分之,敌则能战之,少则能逃之,不若则能避之。故小敌之坚,大敌之擒也”(《谋攻篇》)。所以然者,盖天时无常候、地理有高卑、双方有多寡,绝不可执一法而谋之,即所谓“兵无常势,水无所形,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,谓之神”(《虚实篇》)。

《内经》也认为天时有四时寒暑之别,地理有五方高下之分,人体有男女老少之殊,病位有表里上下之异,治病必因时、地、人、位等之不同,而适各其所宜,方能术施病除。如“西北之气,散而寒之;东南之气,收而温之”(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》);“月生无泻,月满无补,月空无治”(《素问·八正神明论》);刺壮者“深而留之”,刺瘦人“浅而疾之”,刺婴儿“以毫针,浅刺而疾发针”(《灵枢·逆顺肥瘦》);“其高者因而越之,其下者引而竭之,中满者泻之于内……其在皮者汗而发之”(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)等等,无一不是顺势而为、因势利导,并提出“顺者为工,逆者为粗”(《灵枢·一日分为四时》),其与《孙子》思想确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(收稿日期:2008-07-23)

征稿启事

《江西中医药》所设的重点栏目有《明医心鉴》、《滕王阁医话》等。《明医心鉴》以介绍名老中医经验及中医临证心得为主,重点刊载中医关于疑难病的诊疗经验,要求观点、方法新,经验独到。《滕王阁医话》主要反映中医教学、科研、临床的一得之见,要求以小见大,有感而文,语言生动流畅,可读性强,富于知识性、趣味性。